

音乐教育前沿理论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管建华 张天彤

传统·民族·世界

中国音乐学教授访谈录

管建华 张天彤 主编



音乐教育前沿理论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管建华 张天彤

传统·民族·世界

中国音乐学教授访谈录

管建华 张天彤◎主编

北京市教委专项“学科与研究生教育项目”：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艺术实践能力培养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

中国音乐学院重点学科——音乐学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民族·世界：中国音乐学教授访谈录 / 管建华, 张天彤主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672-1125-4

I. ①传… II. ①管… ②张… III. ①民族音乐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J6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5078 号

传统·民族·世界——中国音乐学教授访谈录

管建华 张天彤 主编

责任编辑 巫洁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7-1号 邮编：215021)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10 千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125-4 定价：49.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前 言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中国音乐学界有三次重要的会议在南京、北京、南宁三地召开。

2010 年 10 月,第十六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此次会议是继改革开放后 1980 年 6 月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后三十年的又一次盛大聚会,来自大陆 29 个省市、港台及新加坡、日本、新西兰等地的专家学者 200 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参会人员辐射到大陆地区高校、科研单位等一百余家。

2010 年 11 月,第四届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年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这是继 2010 年 8 月第 29 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北京举办后的又一次事关世界民族音乐的盛会。

2010 年 12 月,第十二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暨第二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研讨会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这是继 2008 年第十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和第一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后的又一次年会会议。

以上会议是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在三个月内连续召开的三次会议,是事关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在新世纪走向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涉及传统、民族及世界音乐在中国音乐文化学术研究中的建构。

出于对这些会议的关注,也出于这些会议有中国音乐学一些著名教授到会,我们组织了中国音乐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对这些到会的教授进行了学术采访。这对研究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学术研究来讲,能够利用三次会议的机会,以传统、民族及世界音乐的论题采访各位教授的专长研究,形成中国音乐学一种专题前沿论题式的信息采集,这些信息采集是一种学术专题聚会。这些专题信息,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音乐学研究在 21 世纪出现的新的方向与变化。



此次采访中,各位研究生通过网络对所要采访的教授的学术背景做了相关搜索,特别是张应华博士、尚建科博士、杨晓博士对将进行采访的对象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问题,此乃正中各位教授的下怀。采访录可以说是精到出彩,是一次历史性的采访记录,也将对从事中国音乐学研究以及关注中国音乐学研究进展的各位同仁和学生有所启发,并引发他们对中国音乐学术未来走向的思考。

编 者

第一辑 第十六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中国音乐研究的“三种精神”

-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开幕词 / 3

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心路历程

- 冯光钰先生访谈录 / 7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高校音乐教育

- 赵塔里木教授访谈录 / 15

民族音乐学研究

- 杜亚雄教授访谈录 / 20

关于中国音乐“去中国化”的思考

- 吴赣伯先生访谈录 / 29

当代戏曲音乐的研究与反思

- 钱国桢教授访谈录 / 34

音乐人类学学科建设与上海城市音乐研究

- 洛秦教授访谈录 / 37

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问题

- 薛艺兵研究员访谈录 / 43

历史的民族音乐学

- 项阳研究员访谈录 / 49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管建华教授访谈录 / 61

区域音乐、整合研究与音乐民族志写作

- 杨红教授访谈录 / 72

目

录

仪式音乐研究

- 刘桂腾教授访谈录 / 86

历史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 刘勇教授访谈录 / 89

中国音乐的语言学研究

- 采访钱茸教授 / 95

关于中国民族旋律润腔读谱法

- 王亮教授采访录 / 101

当下仪式音乐研究的状况与问题

- 刘红教授访谈录 / 103

无土栽培 民族器乐教学的反思

- 岳峰教授访谈录 / 111

第二辑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 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研讨会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 樊祖荫教授采访录 / 117

内蒙古区域音乐的研究和传承

- 杨玉成教授访谈录 / 121

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

- 赵毅教授采访录 / 127

“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

- 张欢教授采访录 / 138

广西民族音乐研究:从个案到整体 从区域到国际	
——杨秀昭教授采访录	/ 143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教授访谈录	/ 151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	
——萧梅教授访谈录	/ 161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与音乐教育	
——姚艺君教授访谈录	/ 170
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高等音乐艺术教育	
——谢嘉幸教授访谈录	/ 177
地方性知识的大视角:我与闽台民族民间音乐	
——蓝雪霏教授访谈录	/ 184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肖学俊教授访谈录	/ 191
民族音乐学研究	
——蔡灿煌博士访谈录	/ 195
民族音乐学的深度田野实践和理论	
——周凯模教授访谈录	/ 201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与传承	
——黄凌飞教授访谈录	/ 211
 第三辑 第四届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年会	
 陈自明教授访谈录	 / 217

目

录

世界音乐研究与教学的现状、理论与方法	
——张伯瑜教授访谈录	/ 223
宋瑾教授访谈录	/ 228
罗艺峰教授访谈录	/ 238
世界民族音乐与多元文化音乐	
——李方元教授访谈录	/ 244
印度音乐文化及音乐教育研究	
——张玉榛教授访谈录	/ 250
世界音乐的教学	
——安平先生访谈录	/ 255

第一辑

第十六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中国音乐研究的“三种精神”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开幕词

尊敬的邹建平院长、米如群书记,各位代表、各位同行朋友: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今天在这里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全体会员及所有参会代表,向主办这次年会并为此付出巨大心力的南京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及各主办单位诸位领导、同仁表示我们真诚的敬意!同时,也向积极参与本次全国会议的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知道,我们的年会已经举行了十五届,十五届年会的足迹遍布南京、北京、沈阳、西安、上海、福州、曲阜、开封、乌鲁木齐、昆明、兰州、杭州、太原,然而,无论哪一届,无论在哪里开,我们都不会忘记“南京会议”。这是因为,“南京会议”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这个学术领域“劫后重聚”之地。所以,从“太原会议”期间一致决定本届会议“回到南京”时,我们就对本次年会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我们同时也相信,第二次“南京会议”一定会圆满成功,一定会成为我们学会成长的又一个里程碑!

孔子云:三十而立!司马迁说: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本届会议恰逢学会的“而立”之年,同时,如果以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交出博士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现代研究”的元年,则又是“百年中变”的前夕。一个民间学术组织是否能在三十年“立”起来?一个学科在一百年间应该有怎样的进步?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很难得到一个结论。但能碰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不仅觉得幸运,也会生出许多感慨!

个人认为,三十年来,始终有三种精神一直在维护着我们学会成长,并成为我们在学术界立足的三大支点。

其一,建设的精神,或者说是“建设性”原则。尽管有关学科称谓、观念、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争辩,有关某一传统理论认定的学术交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然而,在我们这支队伍中,无论是“50后”“60后”这些学界的前辈学者,

还是“80后”“90后”的中生一代,乃至“00后”加盟的新生一代,大家都自觉秉承“积累第一”的治学原则:真诚投入田野、认真进行“个案”考察、努力完成一项项专题研究,从而使我们在音乐民族志、乐种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区域音乐、仪式音乐、跨文化音乐研究方面取得许多实绩,同时还参与了1979—2009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十大文艺志书”的考察、整理、修撰工作,参与了当下刚刚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高校民族音乐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等工作,为学会也为学科的逐步强健奉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并拓展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空间。有一句有名的古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欲求进步,就必须脚踏实地,日积月累,扩充内涵,用坚持不懈的建设精神,使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健,然后才会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自然,以现代学科标准衡量,成熟还有待于时日,但有这种建设精神的支撑,我们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壮实,一天比一天成熟。

其二,开放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孤立发展。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促成了学术研究的新方式和新格局,更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使交流的空间随时在扩展,新的交叉学科随时都在诞生。面对如此开放的一个现代学术环境,我们只能把我们这个小小领域的门打得更大,把我们与诸姊妹学科或国际同一个学科的交流频率、空间拓展得更快、更广。那段古训里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或一个现代学术组织,如果能够像敞开的大地那样,永远以广阔的胸怀接物度量,吸收一切有益的学术养分来充实自己,我们的学术就会充满希望。

很不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曾经经历过与外部隔绝而从事学术研究的无奈境遇。在那样的年代,他们凭靠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一腔热忱,凭靠自己与民间音乐家们的长期交谊和反复考察研究对象所获得的感悟,撰写出一批很有价值的著述。这中间,既凝聚了前辈学人独立治学的精神智慧,更有他们在封闭而艰难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中国经验”。对此,我们不仅心怀敬佩之情,还应该对这种极为宝贵的“中国经验”及时总结,让它成为本学科的一笔重要财富。当然,封闭的环境加上“左倾”思潮的干扰,毕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展,使我们失去了本可以有更多收获的时机,因此,对于这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学术滞后,我们将永远引以为训。

如今,一切已经过去了。我们有幸在一个相对宽松、开放的环境里开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学术之旅。借此,我们一方面向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社会人文学科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敞开了交流的大门,特别是反映这些西方学科近期最具代表性的学派、方法、理论、观念等的译著的

出版,给我们的研究以很多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是与西方民族音乐学越来越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交流。可以说,从南京会议以来,我们关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现状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从早期的简略介绍到一系列经典译著出版,从邀请多位杰出的学者来国内讲学到我们去境外参加国际会议,三十年间,在来来往往的互动中,这个西方学科的相关信息总是有形无形地出现在我们的课堂、田野、研讨会、著述之中,有意无意地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它有如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位“助跑者”,给了我们更加直接的多方面的启示和养分。

当然,学科间的交流吸收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观念的认知、借鉴、吸收、应用,在过去三十年间的不同阶段、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中是有差别的。但大家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以自己的田野考察为基础,以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特质为依据,以继承本学科的学术传统、探索有关学理本土化为原则,作观念、方法及方法论的选择和吸收,通过一次次田野、一个个个案、一项项成果不断加以推进。近期,有学者著文总结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或者称为“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我本人表示赞同。总之,开放的人文环境,开放的学术精神,让以往三十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和蓬勃的生机,坚持这种开放精神,我们的前景一定会更有光彩。

其三,反思的精神。这种精神几乎是与人文学科与生俱来的。学术研究一旦停止了反思,学科的生命也就凝固、僵化了。本学会在1992年北京会议(中国音乐学院)、1998年开封会议(河南大学)和本次年会三度选择“回顾与反思”作为中心议题,恰恰表明我们对“学术反思”在学科建设上的重要意义的重视。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思内容、方法、尝试有所侧重,但只有坚持在学科推进的道路上不断反思,才能保证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健康的机制、有对新理论不停歇探索的动力和方法论的多元取向。本次年会所以再次确定反思主题,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有三十年的经历,有必要从学科历史与现状角度对这一更长时段进行全面清理。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西方人类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批判性反思”给整个人文学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启发。我个人的感受是:他们把学者个人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他们要求自己在田野考察中对研究对象有更坦白真诚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要求在田野考察中加强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在文本撰写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更多的空间值得我们思考。总之,以客观、平等、率真的心境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应该是每一个田野考察者应有的基本操守。鉴于本学科与人类学研究多方面的共性,特别是田野考



察方面的同质性,吸取其理论精华,做好本学科的整体性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当下的学科反思,绝不是清点一下“账目”,简单总结一下得失,而有必要从学科的哲学基础、理论模式、文本写作、本土化策略、学者操守等全面展开。

各位朋友、各位同行,这次年会以后,我们的学会将进入又一个三十年。我们相信,未来的三十年中,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新老成员一定会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曾经说:民族音乐学者是一群唯一能够全面又能个别钻研整个音乐和音乐文化的人。理所当然地,在座的各位就是这样一群人!

祝各位与会期间心情愉快、收获多多!

谢谢各位!

乔建中

2010. 10. 20

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心路历程

——冯光钰先生访谈录

采访人:张应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冯光钰,教授,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民族器乐学会会长。



张应华(以下简称“张”):冯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您调入北京后,就一直在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和全国重大传统音乐研究工程的组织工作,请您结合您的研究经历,谈谈近三十年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情况。

冯光钰(以下简称“冯”):我在这方面实践经验比较少一点,体会倒是有。我退休前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的常务书记,从事音乐方面的行政组织工作。研究工作主要涉及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等,还主持了“四大集成”的编纂工作,我是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主任。我真正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从2000年退休后开始的,此前的音乐研究多属业余性质。

此前主要是搞行政组织及管理工作,当然也参与学术活动,收获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民歌、民族民间器乐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四大集成的编纂工作。“四大集成”的编纂,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项民族音乐建设工程,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真正从事学术研究还是退休后,退休后我基本上每一年出一本书,主要是集中在传播学方面,在我退休前就出

了一本《中国同宗民歌》，是采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的。刚退休又出版了一本《客家音乐传播》，也是用的传播学的方法。到后来就是《戏曲声腔传播》《曲艺音乐传播》《中国民间乐曲传播》《多重视野中的曲艺音乐》及《音乐与传播》等。另外就是写了很多音乐研究及评论的文章。去年出版的《中国曲牌考》，是用传播学、音乐史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交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张：您认为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或者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近三十年来的重大成果在于哪几个方面？

冯：近三十年来重大成果比较多，我认为全国许多音乐家参加编撰的“四大集成”是其中重大的收获，也就是民歌集成、戏曲音乐集成、曲艺音乐集成，以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这部集成还包括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是重大的研究成果。这几部集成集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之大成，是民族音乐方面重要的研究成果，各种集成都是音乐资料、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传统音乐文献的结合，不仅有曲谱，还有录音及部分录像、文稿、照片及图表等。其次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我参与主编的200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可以说是民族音乐学及音乐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少数民族音乐史，我们动员了几十位音乐家，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家参加撰写。由田联韬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达150万字篇幅，也是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此外，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樊祖荫、沈洽、杜亚雄、田青、项阳、张振涛等音乐学家的论著以及乔建中、王耀华的《音乐学概论》，都属于这方面的成果。但我以为当时最大的成就是动员了数以万计的音乐家和民间艺人齐心合力历时二十多年编纂的“四大集成”。

我去年出版的《中国曲牌考》，是进入新世纪动笔撰写的，而这之前则是无法着手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料，我认为写民族音乐学文章要把握住“资料是基础，观点是统帅”的理念。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是不可能提炼出学术观点的，当然仅有资料还不能产生学术成果，必须用深思熟虑的观点去统帅资料，这样方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作为和收获。其实我萌生研究曲牌音乐的念头久矣，但一直受到缺乏资料的困扰，当然也受到学术观点浅薄的局限。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全程参与了集成的编纂工作，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都有了比较丰富的积累，特别是广泛接触到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的众多曲牌后，我感到研究曲牌音乐的时机成熟了。加之199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崇德先生主译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将4466首古代曲牌及又一体由工尺谱译成五线谱，为研究曲牌的源流提供了许多“证据”，使我得以从传播学角度考释曲牌，扩大了视野。所